■第一阅读

称希腊的理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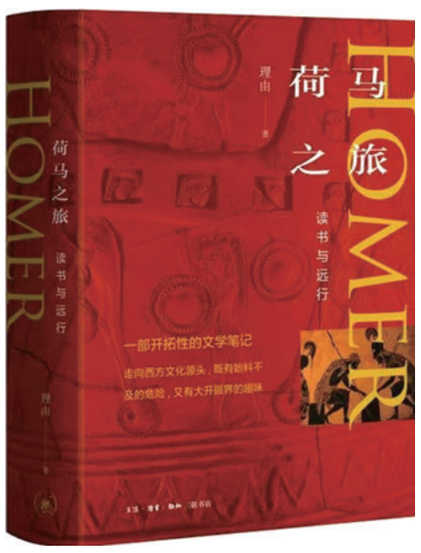
□李建军

契诃夫说：告诉我你读什么书，我就会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

准乎此，似乎可以这样说：告诉我你读过什么书，我就会知道你可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。

因为，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，固然决定于自己的个性和时代的风气，但也是他所读作品影响的结果。作家阅读的经典作品越多，他的写作意识和写作经验才有可能趋于成熟。

就20世纪的情况来看，中国作家的阅读视野和知识构成，显然不够开阔，普遍不够完整。我们否定和排斥中国的古典文学，也极大地忽略了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的英国文学和古希腊文学。尤其是伟大的古希腊文学，我们对它的阅读和接受，对它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，都很不充分。完整地阅读《伊索寓言》的中国作家也许不少，但系统地阅读《古希腊神话和传说》和古希腊戏剧的中国作家，恐怕就不是很多了。至于《荷马史诗》，一行一行细细读过，且颇有所获的中国作家更是屈指可数。



如果说，古希腊人就像伊迪丝·霍尔在她的那本著名的《古希腊人》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19年）中所说的那样，具有质疑权威、渴望知识、善于表达等“十种特殊品质”，那么，古希腊文学，在我看来，就具有富于人性、热爱自由、追求荣誉、悲剧精神、英雄主义、欢乐活泼等精神品质，以及庄严崇高、朴素亲切、清晰准确、坚实有力、不尚雕琢等文学气质。用伊迪丝·汉密尔顿的话说，希腊的诗人“喜欢事实。他们对铺张的辞藻没有什么兴趣，他们讨厌夸大其词”（《希腊精神》，华夏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53页）；这样，他们就始终保持“对事实的敏感”，“对幻想和形容词一直保持警觉”（《希腊精神》，第54页）。在艺术创造上，希腊人倾向于限制而不是放纵自己的自由。他们热爱秩序，服从法则的约束，致力于寻找将混沌引向秩序的线索。在伊迪丝·汉密尔顿看来，对秩序的热爱，对法则的服从，乃是“希腊人最大的特征”（《希腊的回声》，华夏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6页）。

要知道，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，古希腊的寓言、戏剧和史诗，不仅是欧洲文学获取灵感和技巧的武库，而且是西方文学生根和成长的土壤。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都从荷马史诗里汲取了丰富的文学经验。1855年，在写《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》的时候，27岁的托尔斯泰，就从荷马那里获得了深刻的启示：“为什么荷马和莎士比亚一类的人讲的是爱情、光荣和苦难，而我们的当代文学却只有‘势力’和‘虚荣’的无穷无尽的故事呢？”（托尔斯泰：《列夫·托尔斯泰文集》，第二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19页）事实上，托尔斯泰的一些艺术手法，也是向荷马学来的。例如，他描写渥伦斯基与卡列宁见面，用一条狗在下游喝被上游的一条狗搅浑的浑水，来比喻渥伦斯基的懊恼心情；他的这种高妙的比喻技巧，就是荷马最擅长的“事喻”修辞。

如果说，伟大的文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，那么，古希腊文学也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的武库和土壤。我们应该像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那样，从荷马史诗等伟大作品里，获得丰富的文学经验资源。虽然作为一种指代性的修辞，“言必称希腊”不过是对教条主义学风的象征性批评，而不是针对希腊文化和希腊文学的具体批判，但是，从后来的情形看，关于希腊文化和希腊文学，确实很少有人认真对待和热情称道了。事实上，关于希腊文化和希腊文学，中国作家的了解实在有限，所以，纵有“言必称之”之愿望，亦无“称引无碍”之能力。就文学实践来看，我们在中国作家的写作中，几乎完全看不到古希腊文学影响的影子。对古希腊文学的疏离和隔膜，限制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，也不利于我们的叙事能力和修辞能力的提高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最近，我终于意外而惊喜地读到了一本书，一本由中国作家写出来的讨论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书。

这本书，就是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理由先生所著的《荷马之旅：读书与远行》。

作为一部“开拓性的文学笔记”，此书卓异而厚重，包含着作者理由对希腊文学的深挚的热爱与深刻的理解。

正因为热爱，理由才肯不远万里，走近希腊，走近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时代；正因为热爱，他才会如此耐心地阅读荷马史诗——《伊利亚特》16000行，《奥德赛》12000行，他一行行地细读，用心地体会。

足历目见，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致知方式。在阅读中行走，在行走中阅读。理由将行走与阅读结合起来，以所见的外部世界，来印证所读的文本世界。通过观察希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，理由为自己阐释荷马史诗，建构起了可靠的语境和根据。再加上优美的文学表达，遂使他的这部著作，达到了文情并茂、诗意沛然的境界。

理由走近有着2000多座岛屿和13000多公里海岸线的希腊。他行走在这个曾经有过22个城邦的国度里。他探访特洛伊废墟，登上险峻的迈锡尼城堡，徜徉在雅典的帕特农神殿。他眺望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，凝视阳光映照下的爱琴海。他像一个目光敏锐的艺术家一样，发现了爱琴海独有的蓝色。那不是蔚蓝、碧蓝、湛蓝，也不是瓦蓝、青蓝或宝石蓝。用这些形容词，并不能状写出爱琴海所独有的蓝。于是，理由这样写道：“哦，它是妖蓝！就像魔女勾魂的神秘的秋波在闪烁；那颜色说不上妩媚，却极具诱惑力，令人心旌飘摇。”“妖蓝”，这是理由的一个发现。如果没有足历，就不会有目见，就不可能窥见爱琴海那魅惑人的别样的美。

向外，走向自然，走向大地母亲的怀抱；向内，走进文本，走进作者的心灵世界。理由主要从文学性和人性两个角度进入文本，展开阐释。他的目的是说明这样一些问题：荷马史诗的难以企及的诗性之美是怎样创造出来的？为什么说它包含着叙事文学的全部奥秘？在人性表现上，它达到了怎样的深刻程度？在人文精神表现上，它又达到了什么样的崇高境界？

理由认识到了荷马史诗的丰富价值。单就艺术成就和文学价值来看，“荷马史诗几乎展现了长篇叙事文学的全部艺术技巧”。他用生动的例子，揭示了荷马的两个最重要的艺术手法：一个是明喻，一个是直叙。他还揭示了荷马史诗在叙事上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即作者态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。荷马把所有人都当作人来写，绝不随意而浅薄地显示自己的爱憎态度，既不明显地同情自己的同胞，也不简单地仇恨祖国的敌人。理由根据自己的理解，并借助克里斯蒂安·迈耶的观点，完整地概括了荷马在叙事上的三个鲜明特点，即成熟性、隐匿性和现代性。可以说，正是这些成熟而非凡的叙事能力，使荷马史诗克服了3000多年的时间阻隔，赢得了现代读者的强烈共鸣。

人性是理由进入荷马史诗的另外一个通道，也是他阐释荷马史诗的另外一条线索。理由接受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人性观——“人总是人性的人”。他相信人性是文学的恒久主题。在他看来，久远历史上形成的人性，有一个普遍而稳定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结构；这些内容和结构，就是“人的动物性加之以语言为标志的灵性”。他对那种未受扭曲的“裸露的人性”，即纯真天性和健康性格多有肯定。布克哈特在《希腊人和希腊文明》中说：“在那个时代，情感还没有被反思割裂开来，道德的准则还没有被分离到存在之外”。正因为这样，荷马笔下的人物，全都“凭着欲望、本能、感情以及情绪行事放纵，尽兴宣泄他们的愤怒、恐惧、痛苦欢乐和野性”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人性，也许不是充分健全和完美的，但却是非常自然和可爱的。

在荷马的叙事里，希腊人将一切都人化了。宗教是人化的宗教，神是人化的神。神像人一样自然和真实。在理由看来，荷马根据人性创造了神，界定了神性，从而最终影响了希腊的历史进程。然而，荷马的这一伟大成就，可能被我们低估了。理由因此发出了深深的感喟：在荷马之后，“人们不再裸露鲜活的自身”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开阔的比较视野里，深刻地揭示了东方国度民族身心弱化的原因。有必要指出的是，两相比较，始终是理由的一个研究视角。他时时将目光转向自己的母国，顾盼有情，认真思考那些可与古希腊相互比照的问题，例如，中国人为什么不像希腊人那样自然而健康地生活？中国人的人性为何没有朝着希腊人的自由境界发展？中国为何没有产生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那样的史诗？

对荷马的两部史诗的文本解读，是理由这部书最为出彩的部分。他像摩挲瑰美的玉器那样，摩挲着荷马史诗的每一行文字和每一个细节。他还从艺术上阐释了荷马的文学天赋和伟大成就，例如，《伊利亚特》主题的巧妙转换，以及荷马所发明的包括“内心独白”在内的所有技巧。他最终的结论是：荷马在3000多年前所达到的艺术高度，“不仅难能可贵，而且难以企及”。

但是，如果认为理由仅仅满足于阐释荷马史诗的诗学价值，那就错了。因为，他也关注人性，关怀现实。他从荷马的叙事中看见了复杂的人性——看见了攻击天性、嫉妒心和贪欲，看见了人们对荣誉的渴望、对友谊的忠诚，看见了恻隐之心和高尚的利他主义，看见了体育对战争的升华和超越。他试图从古人的叙事里，寻找疗治今世人心的良药。他反对“性恶论”，因为，人性是复杂的，而且是可变的。他肯定孟子、休谟和斯蒂芬·平克等人的积极人性论，但也强调了环境决定论。在分析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差异性的时候，理由表达了对某些“蛊惑”之论的不满，甚至情不自禁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对抗意识。

尽管在本书的结尾，关于人性，关于人性所导致的现实冲突，理由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案，但是，他称道和阐释希腊文学的理由，却是充分的：研究荷马史诗之所以有意义，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伟大的文学，是因为它能对我们认识人性并升华人性，提供深刻的启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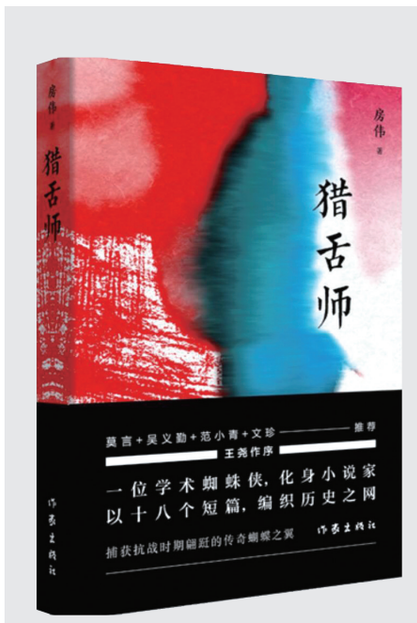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另类抗战书写

——读房伟的小说集《猎舌师》

□丛治辰

2019年，房伟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《猎舌师》，其中的作品都与抗战有关。房伟能在这样难以下手的老题目上别出心裁，实属不易。因此这一系列小说在期刊发表时，就受到广泛讨论，不过我却一直抵触去读。写小说的房伟算是新人，但在此之前，作为文学研究者，他早已成名多年，是搞文学评论的同行，我们交情素来不错。朋友的大作抵触去读，当然是因为我先验地对他能不能写好小说有所怀疑。这怀疑，首先因为他作为评论家和研究者的身份。

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当然懂小说，但研究和创作毕竟在思维方式上有太大差异。写论文以文本和资料为依据，条分缕析，提炼演绎，偏重于理性思考；写小说却不能是干巴巴的理论阐述，必须用形象与情感刺穿理性。搞研究的人，论文写多了，想事情和写东西都是一条一条的，得需要多强大的穿透力，才能从多年的学术训练里挣脱出来，像小说家那么花团锦簇众声喧哗？但是待《猎舌师》出版，读过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实在太过武断了。学者房伟居然同时有着非常强大而敏锐的感知神经，以及与智性严谨的学术表达大相径庭的别一套笔墨。《幽灵军》里，日本随军和尚将死之前站在中国古刹的大殿之外，时间深处的人形树影、庙堂佛音纷至沓来，拥入耳目。房伟将那一幕写得如歌如泣，似梦似幻。当然，也有露出马脚的时候，同样在《幽灵军》里，当这位随军和尚在心里默默对中尉大发同情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孤独的英雄，“他的敌人，不是川军，也不是数不清的中国部队，而是世界的无意义”时，我实在忍不住暗暗发笑：那根批评家的小尾巴总算露出来了。但笑过之后，却也不禁反省：作为专业读者，自然足以因房伟此前的叙述而对中尉有所同情，随军和尚的心理活动实在多此一举；可是对普通读者而言，这一笔会不会反而是画龙点睛，恰恰让读者从中体悟到在别的作品中读不出的深度？的确，在小说家房伟从学者房伟的学养桎梏中挣脱刺穿之后，他的学术思维与习惯反而为小说增色不少。且不说那种冷静复杂的学术思维，令他对家国大义和人性幽微有更加立体辩证的玩味；就看小说里那些令人赞叹的细节，涉及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足以构成抗战时代中日两方的小百科全书，如果没有辛苦的实地调研，没有对当时大量资料档案的爬梳考证，是绝难做到的。这当然有赖于学者的定力和功夫，一个仅仅依赖才华与热情的作者，写不出这样的小说。



或许，也正因为小说家房伟同时也是一名学者，所以又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我的第二点怀疑。我的第二点怀疑是：房伟是王小波的研究专家，也是王小波的铁杆粉丝。王小波的文字有一种奇特的魅惑力，他的爱好者热衷于写小说一点都不奇怪；但同时又有一种危险，就是往往很难摆脱对王小波风格的模仿，无法逃出其阴影的笼罩。多少自称“王小波门下走狗”的写作者，往往只是在语言风格上学到那种玩世不恭的油腔滑调，却并没有王小波怀疑崇高、批判成见、回归常识、热爱自由的思想本质，于是失之轻浮。房伟会不会也是这样？但显然我是多虑了，作为王小波研究专家，房伟对王小波的了解当然更为深刻，对其警惕也就更为自觉。在房伟的叙述语言中，全无一丁点王小波的腔调；但如果细读便会发现，构成王小波价值的最根本之物——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——深深埋藏在房伟的故事当中。房伟并不从正面宏大的角度书写抗战——堂皇正史为王小波意义上的小说所留的空间实在是太狭小了，他喜欢选择普通人的视角，让我们看到卑微的人性在残酷战争的挤压中会如何生长和变化，于是我们便会了解，无论是可耻的背叛，还是壮烈的反抗，内心都有过同样的犹疑与懦弱。而房伟对人性的关注甚至会越过国界——小说集中至少有超过一半的作品，是以日本人为主要关注的。于是我们又会看到，在战争的暴行背后很可能是孤独和恐惧，而残忍的同时也未尝绝无温情。《地狱变》中，“太君”水源清和蒋巽之间惊人又动人的战地恋歌。

房伟写得未免太温情。恋爱中的水源清，分明已经看到埋伏在灌木丛中的八路军，却阻止了蒋巽开火。那种对战争、血腥甚至生命的厌倦，因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而产生的同情之心，以及由爱而生的温柔缠绕在一起，的确抵达了令人深为感触的人性深度，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侵略与被侵略的二元对立。但我的第三个怀疑也由此而产生：有些二元对立，真的可以被超越吗？即便探索人性乃是文学重要职能之一，是否在文学之外，仍有关于正义和家国的边界不可逾越？太过体贴战争当中不正义的一方，是否对遭受欺凌者的情感是一种伤害？我想这样的怀疑不仅仅是我个人的，也必然是小说出版之后房伟要不断接受的质疑。但同样是在《地狱变》中，一处情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被俘虏的女干部，在日军和伪军的众目睽睽下产下一个女婴，这初生的生命让刚刚还在残虐的侵略者们突然沉默，变得士气低落。蒋巽照顾婴儿多日，想要收养这个孩子，却被她的母亲愤怒拒绝。也正是在那次行刑之后，心情复杂的水清源和蒋巽走在了一起。——房伟不仅写出了人性的幽暗、暧昧与脆弱，也写出了人性之决然；他写出了战争以及战争中人的复杂，却并非为侵略和非正义寻找托辞。他写出了战争中生命如草芥的无奈，但惟有如草芥般的人命在经历过怯懦和耻辱之后所作出的选择，才会有分量。这或许恰恰是房伟的抗战书写最有价值之所在：太多堂皇正史已经告诉过我们正义是什么，正确的选择是什么；而房伟从普通人的视角细致入微地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要选择正义，以及正义之道来得何等不易。

■品 鉴

在故乡的目光中 澡雪着世俗的灵魂

□何俊锋

说实话，柞水作家徐祯霞和我并不是很熟，仅在商洛的文学活动上有过一面之缘，但我却通过她的散文作品记住了她的名字。徐祯霞全凭着手里的那支笔，那些真诚唯美充溢着真善美而又回荡着乡情意趣的文字，以及那个从小就埋藏在她心底的文学梦想，成功地从乡野田间走了出来，成为了一名作家，她是在故乡的目光中澡雪着世俗的灵魂。

评论家季红真说过，一个在乡土社会度过少年时代的作家，是很难不以乡土社会作为审视世界的基本视角的。我赏读了徐祯霞多部散文作品，她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写商洛、写柞水的乡土意趣和山水风物以及人文风情，或轻描淡写，或浓墨重抹，或慷慨激昂，或意兴风发，文中情景交融，理趣相映，将故乡那些司空见惯、耳熟能详的家园情愫凝于笔端，化为心头的一股清流，绵绵不绝。徐祯霞的文字细腻饱满、质朴流畅、清新自然而不做作，朴素精准而不浮华，字里行间充溢着“浓得化解不开”的故乡情结。读这些散文，如同品尝了一桌地道纯正的陕南十三花，又如喝了一壶地道的纯粮酿造的“包谷酒”，令人酣畅淋漓、回味无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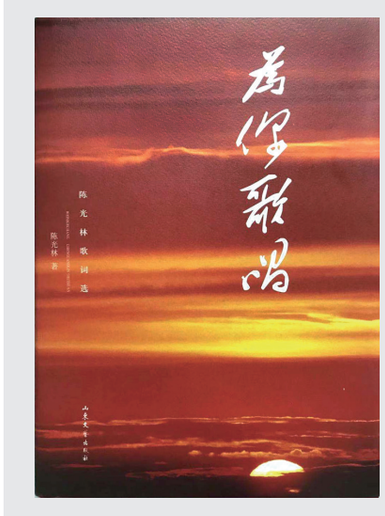
散文是一种最贴近生命和人性的文体，它的魅力或优势，即在于以率真和真情打动读者，以自然平易、清淡无华、近似本色的真诚文字感染读者，从一人、一物、一事的叙写中，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、由现象到本质地去体味生活的真善美，领略自得之趣和人生的真谛。徐祯霞的散文自然平易，她的语言不温不火、不扭扭捏捏，行文顺着思路和语气一气呵成，该土就土、该野就野、该雅就雅，其具有商洛柞水地域特色的语言呈现出诙谐、风趣、轻俏的特点。在徐祯霞的散文作品中，常常会读到这样一些意象：老街、小河、木桥、村落、故园、月光、野果、中药材、荷花、老玉米、山核桃、毛栗子、柴火、炉火……这些大山所特有的意象为徐祯霞的乡土散文提供了良好的土壤、广阔的视野和思维空间，也成为她散文的一道独特风景。

徐祯霞对生活的感知是多方面的，她的内心情感也是丰富多彩的，因之，她的散文题材广阔多样，她把诗意的触角伸向商洛柞水，感受来自生活深处广博的信息，当她捕捉到灵感的火花，熔铸为唯美的散文语言时，她的情感指向总是积极向上的。其间积蓄着作者对生活的热爱，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向往。所以，她总能发现事物中的诗意，常常会把自己融入眼前的景象，和山水风物展开亲切的对话。正是和自然景象无限的亲和力，使她能够从容自如地挖掘出蕴涵于万事万物中的诗意和哲理，同时亮出自己灵魂的色彩，而正是这一切增加了她的散文的韵味和独特内涵，也使这些托物言志的散文，充满了乡情和诗意。

徐祯霞能从生活细节中提炼出诗意，从平凡的事物里挖掘出哲理。例如，她写故乡的《棣花之荷》《寻访上里》《炉火里的冬天》《遗落在尘世中的漆桥》《山中的月光》《一缕梅香入梦来》《河水流过村庄》等文中，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律动，情感的勃发，思想的凝聚，诗意的浓缩，这使她的作品有了一定的厚度、力度和高度。这些文字确如一缕清新、温暖的阳光，透过重重青山绿水携着秦岭的自然风物款款而来，以坚韧与昂扬，圣洁与美好，向人们不断展示着生活的美好与诗意，让人充满对美的向往和追逐。

■书 讯

歌词选集《为你歌唱》出版



陈光林歌词选集《为你歌唱》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歌词选集由中华泰山、生命的歌、千年浩歌、亲情永远、江山如画、高原放歌等六个专辑组成，收入歌词160首（组），作品集入选歌曲《生命的歌》《忘不了我的草原》《人民至上》《家乡的草原》等曾多次获省部级奖项。其中，《歌声飘过草原》入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“中国民歌榜”节目主题歌，大型交响合唱《草原颂》获国家电视文艺“星光奖”。该选集作品主题鲜明、内涵丰富，极具思想性、艺术性、欣赏性。 陈光林不仅是一位词家，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知名诗人。陈光林把感恩祖国和对人民深厚情感作为文艺创作的主题和对象，在歌词集中，爱国爱家爱可敬的人占了其创作大部分，如《落地生根》《泥土的芳香》《向你致敬》等作品，浓烈的真挚情感造就了陈光林歌词的语言和情绪的表达，他认为，心中的歌应和生活、大时代相吻合，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更应该成为表现时代的某种烙印，成为时代的号角，讴歌时代，启迪他人。同时，他的歌词追求对生命的感悟和对生活的热爱、生命的壮美、生命的不朽和生活的阳光，美好的过往永远照亮着他积极向上的心灵，把真情传达给读者。